

王朝

间的对话

《阴晴史》导读

朝鲜领选使天津来往日记

下卷

왕조간대담: 천진왕래한 조선영선사의 일기
(1881년 10월부터, 1883년 9월까지)

왕조간대담: 천진왕래한 조선영선사의 일기
(1881년 10월부터, 1883년 9월까지)

왕조간대담: 천진왕래한 조선영선사의 일기
(1881년 10월부터, 1883년 9월까지)

왕조간대담: 천진왕래한 조선영선사의 일기
(1881년 10월부터, 1883년 9월까지)

왕조간대담: 천진왕래한 조선영선사의 일기
(1881년 10월부터, 1883년 9월까지)

导 言

朝鲜高宗于 1881 年派领选使金允植到天津，与李鸿章等会谈。与金允植对话的，包括北洋大臣李鸿章、候选道马建忠、永定河道游智开、天津器械总办许其光、天津海关道周馥、天津军械所总办刘含芳、招商局总办唐廷枢、青年军官袁世凯。张树声、吴长庆、罗丰禄等一批高级官员以及德国人穆麟德等人也分别和金允植展开了会谈。他们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朝鲜王朝如何借鉴中国的经验，发展洋务。李鸿章劝朝鲜发展经济以自强，并建议其设立外语学校，设立海关。经李鸿章的推荐，德国人穆麟德去了朝鲜，成了朝鲜历史上第一位外国籍的海关官员。金允植回国后著有《阴晴史》和《天津谈草》。

金允植(1835-1922)字洵卿，号云养，祖籍清风。金允植 1835 年农历十月初三日出生于京江的荳湖。他是领相（首相）金堉（1580-1658）的第九代孙。其曾祖父是敦宁参奉、赠吏曹参议金基建，祖父是赠吏曹参判金用善。其父亲金益泰（赠吏曹判书）、叔父金益鼎都是朝鲜王朝的高级官吏。因其父母早亡，金允植姐弟等被叔父收养。其叔父金益鼎曾任星州牧使、

兵马金节度使，为通训大夫（三品官）。后被封为清恩君。1864年，金允植进士小科及第，1865年以恩荫为健寝郎，1874年文科大科及第。后历任黄海道暗行御史、顺天府使、江华留守。1881年被高宗派为出使清国的“领选使”。在中国天津与著名的洋务派领袖人物有长时间的谈话。回国以后积极参加朝鲜的各种洋务活动，先后被任命为经国事务衙门、通商事务衙门协办，工曹判书，兵曹判书，中枢院副议长、议长，经学院大提学。还曾任皇室制度局总裁，皇室会计监察院卿，《国朝宝鉴续纂》纂辑官兼校正官。金宏集内阁当政期间，他充任外部大臣，掌管朝鲜国的外交诸务。金允植参与并推进了朝鲜国许多方面的现代化制度设计。如创立了机器局、现代海关，参与了外交、外贸、军队、会计等多种制度的建设。其间因“乙未事件”被流放到济州岛与智岛一带近十年，后被放还。1908年7月到9月，陪同英亲王殿下访问日本，与日本许多文人有唱和。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吞并朝鲜，把朝鲜高宗皇帝封为“德寿宫太王”，同时为总督府的重要官员封爵。金允植被封为子爵。同年，他作为最早加入日本学士院的朝鲜人，被选为院士，后又任“大同教”总会会长。

金允植有《云养集》《阴晴史》《续阴晴史》《天津谈草》等著作传世。他于1922年病逝。金允植次男金裕问整理有《云养公家状》，比较详细地记录了金允植的一生。

如同我国的李鸿章一样，金允植在自己的祖国也是一直被争议的人物。早在金允植被流放之前，在汉城医院前围攻的人群里，就有“惩办国贼金允植”的口号。在他去世以后，如何安葬他引发了一场争议。如今的韩国学术界对于金允植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金允植是一个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封建文人，他最终倒向日本，成为了一个亲日派的领袖人物。这样

的一个污点是金允植永远也无法洗清的。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辩证地看待其功与过，认为金允植不仅是韩国现代化建设的先驱人物，他在面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时，也充分表现了朝鲜民族的不屈气节。他不仅坚决反对日本的吞并，而且在其后自认为是“亡国大夫”，称病闭门不出，使得朝鲜总督府的中枢院副议长之位置空缺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在1919年的“三一独立运动”中，金允植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警察曾经搜查他的住宅。后因“独立宣言”而被日本人宣判入狱的人中，李容植是经学院副提学（金允植长期充任经学院大提学），金裕问是其次子，金麒寿是其养孙。还有其他一些参与起草“三一独立宣言”的人，也与金允植有密切关系。（参见金圣培《金允植政治思想研究》，首尔大学校博士论文，2001年）

金允植的天津来往日记，是他还没有亲日思想倾向时期的记录。在与李鸿章等中国洋务派领袖人物的对话里，金允植也反复指出，朝鲜与中国都要提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金允植出使中国，是在朝鲜王朝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动身的。当时的朝鲜，东有日本的武力威胁，北有俄国的虎视眈眈。甚至美国、德国和英国等，也趁机要求与朝鲜通商。当时的朝鲜国王是高宗李熙。但是高宗的王宫内外也不太平。作为五百年李氏王国的传承者，高宗幼年登基。其王权最初完全掌握在其父兴宣大院君李应昱的手里。高宗亲政以后，其王后闵妃与大院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朝鲜王廷已经认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金允植《天津奉使缘起》详细交代了他此次中国之行的原因，以及他在天津的各种活动。他说：“我国素无他交，惟北事中国，东通日本而已。自数十年来，宇内情形日变。欧洲雄长，东洋诸国，皆遵其公。舍此则孤立寡助，无以自保。于是中国及日本皆与泰西各国修

好。所立约者近二十国。”（[韩]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第93卷，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06页）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首先一改其蔑视西洋的做法，积极吸取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很快就成了东方的强国。日本天皇派出的使臣以“敕”“诏”等字眼的文书来递交朝鲜。朝鲜王朝十分气愤，以其书契不符格式而却之八年。到了1876年（清光绪二年丙子），日本使臣随兵船进入江华岛，强迫朝鲜接受其条约。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大肆扩张，成了朝鲜的近邻，对朝鲜虎视眈眈。金允植说，中国一直把朝鲜看成是等于“内服”者。李鸿章屡次致函于李最应与李裕元二领相，劝朝鲜实行“联美亲中”的策略。1880年（清光绪六年庚辰），天津海关道台许藻如以李鸿章的意思写成了一封书信，交给了来中国朝贡的使臣。高宗深以为是。但是，朝鲜国内的保守派势力很大。他们强烈反对与美国立约。到了次年，才按照李鸿章的意思，在秘密的情况下，选了一批学生来天津学习。同时，派顺天府使金允植来充当燕行使正使。

金允植一行于光绪七年辛巳九月二十七日（公元1881年11月18日）离开汉城，十月十六日渡过鸭绿江进入我国境内。光绪八年壬午七月初十日（1882年8月23日），因为朝鲜国内发生军变而临时回国。同年九月二十九日（1882年10月18日）再次回到中国，十月二十九日（1882年12月9日）才最后回到朝鲜。金允植一行在中国的留居时间将近一年。金允植在天津与中国官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他们的讨论话题十分广泛，涉及到了国际形势与中国、朝鲜国内的各个方面。但是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朝鲜以后的发展方向。李鸿章劝朝鲜发展经济以自强，并建议其设立外语学校，学习西方。

金允植在中国的活动，是朝鲜王朝特派“领选使”与中外

人士的天津对谈。这是一次长时间的对话，是一次长时间的跨文化话语撞击。对谈的时间跨度达到了 300 多天。这也是关乎朝鲜国命运的旷日持久的对话。是在殖民与反殖民、封建与反封建的大背景之下，在中国、朝鲜、日本、美国、俄国、德国、英国之间展开的“七方会谈”。此次朝鲜使节与清朝大臣之间的对谈，依然是局限于彼此是具有藩属朝贡关系的谈判。从李鸿章等的角度来说，并不把金允植等当作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还不是对等的外交谈判，而仅仅是此类型外交谈判的建立之开端。从情感上说，清朝的大臣也是把金允植等看作是自己人的。金允植回国以后的 1884 年，朝鲜高宗宣布朝鲜独立，不再向中国朝贡。1897 年 10 月，高宗祭告天地，登基称帝，年号为“光武”，国号为“大韩帝国”。从此时到 1910 年日本全面吞并朝鲜这段时间内，朝鲜王廷已经认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金允植自己则是把他此次的中国之行看作是祖国自强之路的一次难得的探究历程。

中国的“洋务派”不能把中国从摇摇欲坠的封建社会中解救出来。自称善于“打补丁”的李鸿章也无法为满怀希望的金允植指出一条富国强兵的康庄大道来。金允植等朝鲜王朝的“洋务派”也照样无法挽救以高宗为代表的封建王朝的危亡。1910 年，日本全面吞并朝鲜。

金允植的思想，是典型的封建士大夫的思想；金允植的记叙，是典型的汉文游记体文字；金允植的诗歌，也是典型的朝鲜封建士大夫的诗歌。他在中国的行程，与他在日本的行程一样，都不仅仅是完成他的肩负的王命，而且是他探求救国救民的“天路历程”。金允植自小失去了父母，在叔父与叔母的关爱下成长。十六岁以后，他投到当时朝鲜九大儒学派别之一的凤栖俞莘焕门下学习。他还是朴珪寿的得意门生。其诗歌、书法、

小学、医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造诣都不仅为本国人所推崇，也为中国、日本文人所敬佩。日本人细井肇《现代汉城的风云名士》一文里不仅称赞金允植的学问，还称赞他身材硕长，银发长髯，一副隐士风度。从《阴晴史》《天津谈草》等著作的记载里，可见细井肇的说法不虚。金允植的中国之行记载，与他的其他诗文一样，是理解其思想演变轨迹的重要线索，也是难得的历史文献。同时，它们也是东北亚人民的共同文化财富。

本书选用底本为1955年韩国国史编辑委员会编辑之鱼允中、金允植《从政年表·阴晴史》。金允植《阴晴史》单独计页。该书页长21厘米，共230页。笔者是1996年第一次见到此书的。1996年到1998年，笔者奉派到韩国首尔（汉城市）的崇实大学任教。该校离国立中央图书馆比较远，但离首尔大学（SNU）很近。首尔大学是韩国排在第一位的国立大学，那里有韩国最著名的国学图书馆“奎章阁”。金允植的《阴晴史》就在阅览室的书架上。但两年的时间实在太短，《阴晴史》也只是翻翻就放下了。在此期间，崇实大学的吴淳邦教授给予诸多帮助。吴教授是台湾大学的中文博士，专门研究我国晚清小说。我在崇实大学任教期间，他即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研究专著。

1998年回国以后，我并没有中断和韩国学者的联系。随着中国与韩国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发展，我们的交流更多了。在我所居住的天津六里台和万德庄，一大批餐厅、书店、百货店都有韩语标牌。因为我妻子到韩国首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天津师范大学领导为照顾我的生活，2002年再次派我到崇实大学任教。在此期间我接受了南京大学钱林森教授主编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朝韩卷的写作任务，还荣幸地成为该丛书的编委。这次，我可以比较专心地读韩国先哲们的著作

了。所幸的是，林基中教授主编的《燕行录全集》已于2001年由韩国的东国大学校出版部出版。我在其中见到了金允植后人手书的《天津谈草》。当时的感觉真是如获至宝。身在异国他乡，却可以在自己的研究室里读一百多年前朝鲜文人所记录的天津，其亲切感真是无法形容。金允植和韩国历史上第一批近代留学生所居住的东局，现在的地名是东局子，我家在那里曾居住过四年半。我所住的临营西里后面就是军营。我甚至猜想，金允植的宿舍就在我那栋楼的下面。我现在所住的六里台，与曾经设立“朝鲜馆”的天津机器局南局（地址在海光寺）只有不到一站地的距离。

笔者于2004年8月回国。所撰《半岛唐风：朝鲜作家与中国文化》也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于同年9月出版。研读金允植《阴晴史》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原书错误很多，只好边读边改。并非笔者对韩国前辈学者不恭，原书错误较多的情况实乃时代造成。1955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鱼允中、金允植《从政年表·阴晴史》就已经出版了。由时间上可以推知，原书的标记与断句工作，是国史编辑委员会的诸位先生们在炮火声中完成的。另外，金允植的原稿是毛笔书写，本身就不一定清楚，而且朝鲜语是拼音文字，一个朝鲜语文字可以代表几个、几十个汉字。即使是饱读诗书的国史编辑委员会的先生们，假如没有来过中国，也很难判断出“北京永□门”中间缺的是什麼字。他们对于天津的河北大街、大直沽、紫竹林的情况所知更少。况且，金允植的这些记录，都是在朝鲜王朝和清王朝都很不安定的形势下书写下来的。除了公文、奏报和条约外，其他的文字几乎都是一挥而就写出来的。金允植自己也是用朝鲜语思考，而以中文写作的。他的许多汉字的书写前后并不一致。

金允植到天津来，名义上是来中国学习工业制造，实际上

是来中国学军工制造并与李鸿章等会谈的。金允植到天津的另外一项使命，是与李鸿章探讨如何应对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外交与通商要求。其中许多会谈，都是两国的最高机密。金允植与袁世凯的很多谈草因为涉及军事秘密，当场就烧毁了。还必须说明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吞并了朝鲜以后，推行奴化教育。朝鲜国学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所受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鉴于上述原因，我以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金允植《阴晴史》原书看作是一个简单的文本。它是一个书写之后又被书写的文本。其中充满了“文本间性”。我以为，看一看120多年前中国与朝鲜两个即将灭亡的封建王朝间进行了什么样的对话，看一看朝鲜王朝如何在现代与封建、开放与封闭的十字路口进行抉择，看一看朝鲜王朝的文人是如何书写这些对话的，是十分必要的。

附录收录的是笔者指导的天津师大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卢庆侠写的论文。该文所论述朝鲜王朝的书写转型问题，相信会对理解金允植的汉字书写有一点帮助。

金允植《阴晴史》分上下卷。笔者将明显属于韩国国史编辑委员会诸位先生所注称“原注”，明显属于金允植书写的则称“原文”。“原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纯用汉字作注，一种是用韩文作注。后一种情况我都将其译为中文，并标上“韩文”二字。本书内“韩文”“朝鲜文”是一个概念，都是指世宗大王所创建的朝鲜文字。笔者所称“原书”，即指国史编辑委员会1955年编成之书。

序 言

中朝邻邦，山水毗连，两国人民很早就互相往来，传说殷朝末年“箕子入朝，诗书从焉”一事，便见之于东国史书。自此以降，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而且两国人民皆爱好和平，外寇来犯时，双方同仇敌忾，彼此声援，并肩奋战，情同手足。这是人类关系史上光彩照人的一页。

历代史学家关注这些史实，时有著述公诸于世。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史笔趋于细致而深入，断代或个案研究渐渐形成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近代史研究尤得青睐。因为这时国际局势阴云密布，列强们虎视眈眈，觊觎中朝广袤而富饶的疆土，开启民智、富国强兵成了两国人民的燃眉之急。他们审时度势，采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以求克敌制胜，捍卫主权。描述并总结这段历史，不仅可以提供两国人民奋发图强的客观历程，而且可以提高民族自信心，为今天迎接挑战、发展自己提供精神支柱。

治史自然离不开史实，而两国关系史的原始资料又有汉文和朝文两种文本。它们各有侧重，各有特色，理应互相补充，互相发明。所以，我国学者若能同时利用朝文资料，便能使自己的论述更加可信，论点更加坚实。刘君前不久曾有著作《半岛唐风》问世，令人耳目一新，这次又转向更为基本的研究工作——进行朝鲜文化史料的整理与介绍。当前关于文化史、思想史之类的研究方兴未艾，试图在抽象层次上建言立说者不乏其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学说不管多么抽象，结论不管多么概括，都应该以史实为基础。唯有基于实证主义的观察和探索，才能归纳出无懈可击的史说和史论。

朝鲜虽是近邻，但在文化习俗、典章制度诸方面与我国多所不同。针对原始资料的难点和重点，刘君便做了不少注解和阐释，譬如关于原作者其人、其书、其政治抱负等等，凡是在他看来读者可能会感到陌生的地方，都有详细解说，并做了大量的翻译与整理工作。因此，这本导读之作嘉惠士林的性质也益加彰明。

周发祥

二〇〇六年二月

《阴晴史》导读

下卷

“四月初一日（清光绪八年，上之十九年壬午。原注）丙辰申刻，日食有半。”

（〔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 133 页）

金允植记录的是一次日偏蚀现象。这一天是朝鲜高宗十九年（光绪八年壬午）的四月初一日，也就是公元 1882 年 5 月 17 日。“申刻”是下午 4 点。

“初二日，大风。李浣西（祖渊。原注）来访。共行诸厂略观，即还南局。义州通事金明述入来，带三月十七日出下加平书，即抵李浣西者也。李应浚便，闻美使将出，专书来召浣西而还。盖上意也。此便无家书。”

初三日，风。十点钟往海关署。鱼、李二人自南局先已（当为‘已’字。笔者）来会。以开海禁、通商、驻使事，移时笔谈。周玉山云：现钦宪王文韶，系是军机大臣。见皇上、皇太后，奏达诸事。贵国如有不便事，可乘此傅相（李鸿章。原注）及钦宪在时，录陈议详为可。鱼友复申北道两市及敕行支供节，别行往来之费。周云：他事皆可代禀。年贡一款，事体不轻。从便徐议。

第录一通寄送，当转奏矣。又曰：安南与西国议约时，不曾明言中国属邦。现今为法人所欺，弱不可支。中国欲与之争论，彼以不相干涉为词。此次贵国与美国人条约底稿中，首系‘属国’字样，非要虚体面也，正防他日之虑也。智者当自知之。诸人皆称谢。

主人设便饭待之。饭罢辞出。访刘芑林，不遇。向南局留宿。一斋（鱼允中。原注）、浣西夜草录陈诸件。敕行所费银二万余两、钱十余万两。境内诸官迎送之费，不在其中。节使行银万余两、钱十余万两。别使之行，稍减于节行。北道两市单市之费，米九千余石、钱九万余两。此其大约也。”

（〔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33页）

原书上有注曰：“海禁、通商、驻使等事协议”“敕使费用”“北道两市费用”。

原文“下加平书”里的“加平”是地名。与中国文人一样，古代朝鲜文人也喜欢以某人的籍贯来称呼之。“钦宪”的意思就是钦差大臣。“宪”在这里有尊敬的含义。原文里的“鱼友”是金允植对鱼允中的亲切称呼。金允植把从事官尹泰骏也称作“尹友”。

鱼允中在计算花费。他所计算的花费有两大类。一类是中国与朝鲜互派使节的花费，一类是在朝鲜开市的花费，后者下文还要涉及。这里，我们只谈第一类。鱼允中的计算是很有意思的算法。在此之前，如金允植所说，朝鲜与别的国家没有通商往来，所以，朝鲜使节团往往伴随着双方大规模的贸易与交换。即使是来往的使节，也带有大批的货物。金允植带来的这一大批人，来往都要买些物品带着。朝鲜学徒在宁河县大封桥遭遇抢劫事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回国朝鲜人小额贸易带回的物品。即使是两国宫廷之间的礼品，以及大臣之间的礼品，也不过是在“礼”的包装之下的物品交换。它们是经过反复考虑后才赠送给对方的，也是对方所急需需要的。而且，历年来北京的朝鲜使节都感叹中国皇帝的慷慨与大度。因为中国的宫廷，不管是明朝的还是清朝的皇帝都要赏赐给使节许多物品与金钱。

金允植的写法很讲究。他说，“一斋（鱼允中）、浣西夜草录陈诸件”。金允植自己没有参加。他确实无法参与计算。因为他太清楚此次领选使之行的花费了。名义上是朝鲜国派人来学造，却既不交学费，也不需要住宿费、伙食费。中国的学生还要经过考试录取，朝鲜国的学徒不受年龄限制，也不经过中国方面的任何考试就来了。

鱼允中算的是小的方面，而忽略了大的方面。从朝鲜太祖开始，就制订了“事大”而求“字小”的对华外交战略。中国是保证李氏王朝正统性与合法性的外在力量。假如遇到外敌入侵，可以直接向中国请求援助。假如遇到国内暴乱，也可以向中国请求援助。五百年的王朝可以安然延续，其在军事与政治方面的花销俭省了多少，实在是无法计算的。这就如同 1953 年以后韩国本土的美国驻军一样，要分两笔账来算。50 多年来，韩国的美驻军大都维持在 4 万人左右。这些驻军的花费，韩国政府要按照一定的百分比来承担。表面上看来，这是韩国的一大笔开支，是人民的沉重负担。但是，美军之所以没有被要求撤走，其理由之一就是划算。韩国政府的计算方法是，一旦三八线以北发动进攻，就会有美国兵协助作战。即使是平时的冷战，韩军也不在乎，因为美国人自己会带来最好的武器。这些武器的花销也就不用自己掏腰包了。

鱼允中没有计算的，还包括历史上的事件。1640 以后来中国的使节，往往会多次重复他们对于明王朝的怀念。他们说，明朝的灭亡，是因为大明倾天下之兵、用全国之财力来帮助朝鲜抗击倭寇，才使得中国人民无法生活，才引发了李自成起义，导致清兵入关的。但是，鱼允中没有计算这些。后来，鱼允中在俄馆播迁事件中被杀，其身份恰恰是度支部大臣。

“浣西既承促归之命，虽明日，期将发。行色甚匆遽矣。

（周玉山赠鱼一斋、李浣西纨扇各一面。手书律诗二首。

其赠一斋诗云：

抚剑弯弓岂足豪？坦然心地与天高。

大夫射雉求娱肉，国事亡羊如补牢。

雾隐南山徒自惜，石填东海恨空劳。

金丹一粒凭谁换，万里扶桑吊紫鳌。

其赠浣西诗云：

淡云微雨石城秋，清夜红灯话驿楼。

世事积薪防厝火，书生枕颈梦封侯。

百年哀乐原如戏，一饱江湖不易求。

今古是非谁辨得，碧天杳杳月如钩。

不知何人所作。而俱有深意。读之忭欢。原注)”

(〔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33~134页)

周馥赠送鱼允中和李祖渊的诗歌确是精品。“抚剑弯弓岂足豪？坦然心地与天高”道出了周馥的精神追求。其境界也比较高。“今古是非谁辨得，碧天杳杳月如钩”则表达了周馥对于满族统治者、对于时势的无可奈何。

从金允植的记载看，周馥大约没有注明二诗的出处。

“初四日，风。乘车还东局。修书。夜半，崔志华亦传尹友石汀（泰骏。原注）书，浣西行期不可刻缓。因传相令夜子时乘轮船回国云。故即付书及封饭银以送。己（当为‘已’字。笔者）亥正矣。

初五日，晴。往北城下，观压药、沙药、光药诸厂。仁石与此中人，持小网打鱼。得二尺许鲤鱼二头。

乘铁路车回局。其疾如飞。虽不及汽车，亦甚快也。

鱼友一斋自南局来，终宵晤谈。”

(〔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34页)

原书“得二尺许鲤鱼二头乘铁路车回局”断句有误。

崔志华是通事，即翻译。“亥正”是夜里十点。

看来，金允植所见到的天津北城环境还很好。用小网就可以打上二尺长的鲤鱼。

鱼允中和金允植是第一批在中国坐火车的朝鲜人。而且，金允植已经知道了汽车。

中国的唐胥铁路自 1881 年初动工，11 月刚刚完成。1882 年 5 月 21 日金允植坐的火车，已可以通东局了。

“初七日，晴。甚暖。着单布衫，与一斋入观机器、电气厂。酉初，鱼友还南局。南局总办送学徒详案咨会。修答以送。阅《富国策》三卷，西人丁韪良所著也。

初八日，阴雨，仅可浥尘。微有雷声。今日东俗悬灯，犹中国之元宵张灯。去年今日在顺天，夜观邑中灯火，遇雨还衙。今在天涯旅馆，寂寥听雨。人事之不可知有如是矣。夜，身气不宁。达晓呻吟。夜，工匠等往局内河沟中，捞鱼甚多。或有长三四尺者。

初九日，雨余晴和。文芝轩来话。今日身气亦不佳。

初十日，晴。身如昨。”

（〔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 134 页）

原书上有注曰：“《富国策》”。

《富国策》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著。在近代中国是一部知名度很高的著作。

丁韪良（William Alexd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于 1850 年被派到中国。曾经担任美国公使的翻译。后曾任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1916 年在北京逝世。

金允植对小雨的描述，活用了王维的诗句“渭城朝雨浥轻尘”。他追忆的是 1881 年朝鲜过佛诞节的情况。至今朝鲜半岛还是把农历四月初八看成是很重要的节日。佛寺等地都要挂带莲花座的灯。

金允植笔下的天津捞鱼极易，就在他所居住的东局，“夜，工匠等往局内河沟中，捞鱼甚多。或有三四尺者”。天津处于九河下梢，历来盛产鱼虾。而三四尺长的大鱼在东局内河沟里就可以捕获，可见鱼虾之多。

“十一日，晴，暖。身气少胜。闻‘镇海’兵船回津。即遣郑麟兴持名帖往探。陆参将仑华未刻回言。本船于去月二十一日抵仁川。仁川本官迎入府中待之。自朝廷定大、副官及议约。大官姓申，

老人。想是申辅国枕。副官姓金，曾使日本之人。想是景能（金宏集。原注）也。约条并依稿讲定，惟米谷不许出口。今月初七日，‘镇海’船先还。初八日，美船起碇。不知直还本国，将使来津。同日，丁、马二人入京城。意自上有请见忘劳之命也。初十日将回仁川，发船亦未可详知。又有日本船一只，在港口云。似觐两国和事也。自官给陆船，米几石、牛一只、猪几口。牛甚瘠。诸样饭菜，均不可吃。港口则水深可泊，而萧条荒陋。又无可卖（当为‘买’字。笔者）之物。且人心不驯，物价甚腾。军兵等所带银钱，无一个变卖。妇女衣服粗陋，极不好看云。”

（〔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34~135页）

原书上有注曰：“韩美修好条约缔结之韩国代表”（韩文），“中国人之仁川观”（韩文）。

原书“军兵等所带银钱无一个、变卖妇女、衣服粗陋、极不好看云”断句有误。金允植记述的是军官陆仑华的话，其本来意思是船上军人所带去的银钱，没有一个钱被拿去花掉。因为中国的钱在朝鲜不能直接去花，所以要“变卖”。“变卖”在这里的含义就是“兑换”。现代韩语里写成汉字“换钱”。原书作者不明白，断句后的句子成了“变卖妇女”。

“大官”申橈与“副官”金宏集大约相当于今日的代表团团长与副团长。原文里的“大官”之名，在高丽时代就出现了。当时的西京留守官和六曹的守官都称“大官”。朝鲜王朝现在要行使自己的外交主权，其派出的外交使团之长官也被称作“大官”，是有深意的。

金允植并没有因为陆仑华的话粗，而在其日记里将其删除。之所以如此，是朝鲜半岛几千年优秀的史家传统在起作用。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作“史”是有道理的。

“同日，南局捻（当为‘总’字。笔者）办王得均送咨会。以尚濡（当为‘沅’字。笔者）出去时给送电气二十三种，详报宪台。据批咨会，欲其存案也。

钦加二品銜、总办行营机器制造局、即选道王